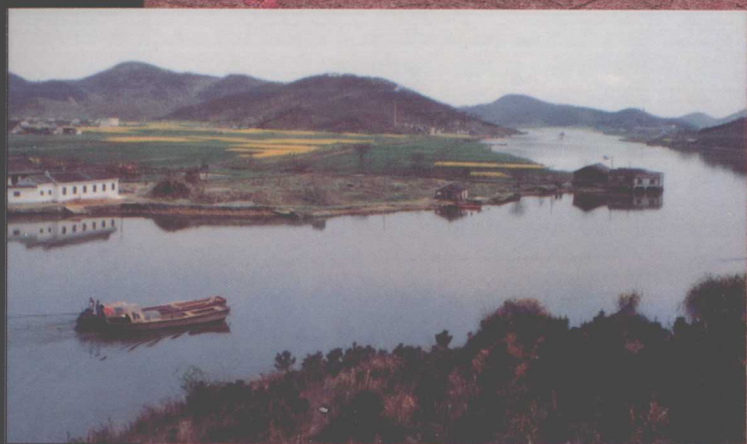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光主编

河姆渡文化史话

季学原 诸焕灿 著



宁波出版社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之一

河姆渡文化史话

季学原 诸焕灿 著

宁波出版社

本册著者:季学原 诸焕灿

责任编辑:马玉娟

封面设计:陈 罡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 光 主编

* * * * *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余杭大陆友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5 插页:24 字数:765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套

ISBN 7-80602-342-9/K·26

定价:全套 60.00 元 本册 8.50 元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吴 光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至少七千年的繁衍生息征途上，我们的先民凭靠其聪明睿智与勤劳勇敢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浙东文化”等等名闻遐迩的文化典型，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从而使浙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愧于“文物之邦”、“文献名邦”的高雅称号。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四千万聪明勤劳的浙江人民，正在继往开来地建设一个经济上繁荣开放、文化上多元发展的文明新邦。

处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作为知识界、文化界的成员，我们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整理和总结浙江七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原貌与经验，并以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我们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从而为浙江现代化与现代浙江人提供一份可资了解历史、开创未来的资

料,这便是本人和本书编委会诸同仁发愿编纂《浙江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根本动机。

然而,“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浙江文明源远流长、绚丽多姿,其史料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总结其历史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更非一人一伙所能竟功。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个并无官方拨款而靠民间赞助的学术研究团体,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皆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志大而“财”疏,因此只能量力而行,做一些力所能及而又稍具特色的文化研究工作。于是,我们选择了浙江文明史上最有光彩、最具特色的几个侧面与门类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因此,首先集中精力编纂了这套《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今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希望能够组织深入研究浙江文化史的专著丛书。例如《浙江文化名家丛书》、《浙江历代思想家丛书》等等。

本丛书是由本主编组织策划、并与各位顾问、编委反复协商后确定专题、再约请各专题所涉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撰著的。其特色在于,它选择了浙江区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历史题材为研究对象、以史话为写作体裁、将若干种各自独立成书的小型学术著作合编为一部综合性的区域文化丛书,从而构成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的系列历史知识读物。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总体反映从史前河姆渡文化到清代姚江文化变迁史的《河姆渡

文化史话》，有生动描述人类玉器时代辉煌业迹的《良渚文化史话》，有系统记载浙东学术发展脉络与评述浙东优良学风的《浙东学术史话》，有全面反映浙江地方戏曲之起源、发展、演变状况的《浙江戏曲史话》，有结合实地考察、描述浙江佛教建筑特色和浙江佛教发展演变历史的《浙江佛寺史话》，还有经过专业梳理提炼而生动反映浙江物产特色及其文化内涵的《浙江丝绸文化史话》与《浙江茶文化史话》。

收入本丛书的各部著作，经过各位著者的精心撰著和编者的细心审改，基本达到了“语言流畅、品位精美；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要求。著者力求避免泛泛介绍、平铺直叙和史料堆积，而以散文笔调写历史，既写出了所涉主题的发展演变脉络和历史作用，又写出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及其蕴涵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尽管各册专著在写作风格与技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不齐、文采有别的问题，然而我敢断言：本丛书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并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

本丛书在课题策划和组稿过程中，得到了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浙江大学毛昭晰教授以及著名地方志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魏桥编审等专家学者对研究课题的积极支持，并受到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支持。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还得到了台湾南华管理大学及龚鹏程校长、浙江

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陈文宪总经理、浙江金义集团及陈金义总裁等单位和个人对本研究课题的部分资助。尽管资助的数量有限,但他们支持学术文化研究而不求回报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和各位作者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让我们再接再厉、携手共进,为正确认识、深入发掘、发扬光大我们浙江七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优秀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为在新世纪开创浙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而贡献心力吧!

(1998年10月写于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
1999年6月改定于朝晖寓所)

目 录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引言 河姆渡人的文化足迹·····	(1)
一 河姆渡文化遗址——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6)
二 舜江岸边说舜帝·····	(13)
三 千古高士严子陵·····	(20)
四 源远流长的虞氏文化世家·····	(26)
五 越窑秘色瓷：中国陶瓷的瑰宝·····	(34)
六 梁祝爱情：民间故事一奇葩·····	(40)
七 “江湖诗派”一才士：“姚江诗祖”高菊畴·····	(51)
八 姚江畔的续兰亭会·····	(57)
九 东方魔针：针灸学的创立者滑伯仁·····	(61)
十 心学大师王阳明·····	(67)
十一 姚江学派与姚江书院·····	(74)
十二 古代戏曲四大声腔之一：余姚腔·····	(82)
十三 戏曲家吕天成及其《曲品》·····	(88)

十四	蜚声中外的古老藏书楼：宁波天一阁	(94)
十五	中日文化交流元勋：朱舜水	(100)
十六	民主启蒙大师黄宗羲	(107)
十七	二老阁：清代浙东学术活动的一个 中心	(114)
十八	史学奇才邵晋涵	(120)
十九	五桂楼：浙东第二藏书楼	(127)

引言：河姆渡人的文化足迹

河姆渡文化遗址被发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增添了光辉灿烂的点睛之笔！经其一点，河姆渡先民及其后裔创造的姚江文化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豁然开朗。横贯河姆渡文化区中心的姚江，虽然只有 100 余公里，在长江下游区域只占小小的一块，但是，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它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典型范例，在整个中华大文化的经络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穴位”（余秋雨语）。

河姆渡文化遗址是 1973 年 6 月发现，同年 11 月开始第一期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地质资料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洪荒时期，在大海之滨、四明山下诞生了一条小江——姚江。它原是流向北方注入东海的，后来因为多种地质变化，姚江西侧的地面升高，姚江水位上升，经过无数岁月的积淀，故姚江改变了流向，掉头向东，经现在的上虞、入余姚，过慈溪、鄞县，至宁波市区与奉化江一见如故，紧密拥抱在一起，汇成甬江，投向大海的怀抱。如果从古姚江算起，它至少已有万岁高龄。

水，是人类的生命源泉。正是这条百里姚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南方老母。7000 年前，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

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繁荣时期，河姆渡氏族的先民们沿姚江而居。姚江哺育了他们，他们开发了姚江，经过 70 个世纪的艰辛开垦、不断创造，终于创造出了令人惊叹不已的文明奇迹，向全世界庄重宣告：中华文明的源头远在 5000 年前的黄帝之前，中华文明史远远超过 5000 年；中华文明的起源绝不是单元的，长江和黄河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她们是分居中华大地南北的一对亲姐妹；中华文化也不是单纯的农耕文化，河姆渡遗址区中出土的独木舟遗骸、木桨遗存、舟的模拟艺术品陶舟、鱼藻纹陶盆和大量的鲸鱼鲨鱼等海生鱼类、贝类遗骸，以及中国海岛、东亚、南亚、大洋洲、美洲的种种考古发现均表明，河姆渡氏族是具有海洋民族特征的民族，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已经具有相当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

一幅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河姆渡文化美景图！

姚江，这条与河姆渡人一同生长的小江，漫江碧透、水波荡漾，宛如一条徐徐飘拂的绸带，7000 年来，始终以其难以估量的生命伟力，负载着河姆渡文化乃至长江文化的优良基因和创造潜能，奔向浩瀚的太平洋，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了多方面的辉煌贡献，其创造力和辐射力的巨大深远，正从多方面日益鲜明地显现出来。从这里，当代学者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把握住整个长江文化的母体特征、活动形态、结构体系、承传关系和辐射状况。

从河姆渡氏族开始，河姆渡人的子子孙孙，构建了一幅涌流不息的姚江文化发展史。7000 年来前呼后应，绵延相继，高潮迭起，异彩纷呈，从氏族文化到宗法文化到民主文化，诸种形态俱备；从发轫期到渐进期到繁荣期、鼎盛期，再到转型期，一脉相承，脉络分明。随着历史车轮的加速，河姆渡文化发展的高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其力度和幅度越到

后来越大。

何谓“高潮”？我们认为，大体上可以从文化名人、文化精品和影响深远的著名的文化群体的产生，以及它们的辐射力的深度、广度为标识。继河姆渡氏族中的创造群体之后，上古五帝之一的舜帝曾苦心经营于姚江之滨：“耕于历山，陶于雷泽，渔于海滨。”《墨子·尚贤》和《抱朴子内篇·祛惑》等对此均有记述。虞舜父子至少在农耕、陶瓷和海洋文化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尧帝才决定禅位于舜，姚江人民才用多种方式不断歌颂他、祭祀他。

发迹于西北的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全国后，第五次南巡至姚江之滨。他似乎看出了这片文化宝地之价值，在这里设置了余姚诸郡县，屯兵马渚，登高远眺，极目沧海。据传说，他于此再次派遣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百工、谷种，自达蓬山起航东渡日本。为中日友好交流史写下了最早的一章。

前后汉之交，这里又出现了道家的杰出人物、庄子学说的继承者严光（字子陵），这位高士以其超特的学行享誉古今，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品格风范的影响是很大的，历久不衰的，姚江人民尊之为四大乡贤之首。至东汉后期，官学衰微，世族势力日盛，私学因势而起，学术文化遂由官学转向私学，家族文化格局随之形成，姚江便以虞氏家族文化为代表。虞氏自东汉徙居姚江后，世代研习孟氏《易》。三国时，虞翻以经学，特别是易学的成就而成为虞氏家族文化的揭幕人，从而确立了这个家族文化群体的不朽地位。如果说三国是虞氏家族文化确立期的话，那么，两晋至南朝，特别是东晋则是其长足发展期，虞喜、虞预、虞炎等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过四百余年的开拓、积累，至唐初，虞氏

家族文化进入辉煌期,出现了虞绰、虞世南等文化名人。到宋代,余姚一县中进士者便达 130 多人,高翥、高似孙等均以其文学、史学、目录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也就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华文化的明珠越窑和秘色瓷在姚江之滨绽开了璀灿绚丽的花朵,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赢得了盛誉。

经过 6000 多年全方位的开拓,至明清,姚江文化进入了鼎盛期。明代,余姚一县中进士者多达 380 多人,“姚江文物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词。明代中叶,是中国文化孕育一次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时,河姆渡文化后裔又一次显示了空前伟大的历史活力,在中国文化史的一些主要领域中,这块文化宝地上既出现了集大成者,又出现了革故鼎新者;既出现了哲学理论上的伟大创造者,又出现了经世致用的伟大实践者。河姆渡文化带成了培育中华人文思维的一片神奇息壤。王守仁(阳明)、朱之瑜(舜水)和黄宗羲(梨洲)等大师级的思想文化巨人接踵而出,姚江学派和清代浙东学派中大师级的学者陆续涌现,他们各以其巨大的学术成果和革新实践形成一股空前强劲的历史合力,把河姆渡人创造的文化推向全面创新的高度繁荣期。诚如余秋雨先生在《姚江文化史》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河姆渡人的后裔“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制高点地位上。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流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不亚于滔滔黄河了。”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第一个、第二个黄金时代的话,那么,以河姆渡人的后代为代表的明清就是第三个中国文化思想的黄金时代了;如果说第一个黄金时代集中体现在黄河流域的话,那么,第二个黄金

时代的重心便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而第三个黄金时代的重心,显然已经到了长江流域。而河姆渡人的故乡,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显然都是长江流域中最具创造伟力、长盛不衰的一片神奇的文化与思想的沃土。

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体系正在构建,人们正踏着坚实的步伐迈向新的历史征途。为了继往开来,人们怎能不对河姆渡人的文化足迹产生前所未有的探讨兴趣呢?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们编撰了这部《河姆渡文化史话》,抛砖引玉,——期待全方位的“河姆渡文化”之学早日诞生。

一 河姆渡文化遗址： 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谁能够想到，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小小平原上，紧依姚江的一个中国小渡口旁边，在那山花烂漫的春天里，忽然在农民的锄头下边冒出了一个母系民族的原始村落遗址！面对这个如此古老、神奇而又如此真实、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区，不但中华民族的子孙为之惊叹不已，世界许多科学家也为之惊叹不已，他们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进行考察、研讨，著书立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罕见的。

迄今所知，河姆渡遗址占地约四万平方米，先后于1973年11月、1977年10月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800平方米。在仅占整个遗址面积百分之七的发掘面中，专家们已经获得了极大成果：探明了河姆渡遗址是由四个各具特点、代表不同时期，互相叠压，相连相续，富有内在联系的文化堆积层构成的，出土大批内涵丰富的文物，除了几十万片碎陶之外，已发现的珍贵文物有近七千件，被人们誉之为“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遗址的四个堆积层厚达千米，直如四大部帙卷浩繁的史前史资料长编。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等研究机构的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

第一文化层（即第四期文化遗存），距今7000—6500

年；第二文化层（即第三期文化遗存），距今 6500—6000 年；第三文化层（即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 6000—5500 年；第四文化层（即第一期文化遗存），距今 5500—5000 年。

在四个堆积层中，最引人遐想和深思的是第一文化层，数量大得惊人的人工栽培稻谷遗存，大片榫卯结构的干栏式建筑群遗迹，大量的水陆动物遗骸和植物遗存，大批骨、木、石、陶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原始艺术品遗存等等，都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真切而生动地展现了河姆渡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情景。

面对这个文化大宝藏，多方面的科学家如痴如醉，投入了发掘和研讨工作。第一期发掘报告公布后，1979 年便载入了日本的《世界考古学事典》；1980 年英国的《剑桥考古百科全书》不但评介了它，而且配以彩色图片；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将其画入标举世界著名文化景点的世界地图。

河姆渡遗址到底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文化影响呢？目前，我们只能作如下的简要描述：

第一，它一举推倒了中国历史的多项重大结论。首先，它修正了遍载各类典籍和教科书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传统观念。那么多重要文化遗存，无可置疑地表明：中国文明史至少要推前两千年！“五千年文明史”的旧说，主要综合《周易·系辞下传》所载的包牺氏、神农氏、黄帝以及尧、舜的众多发明而作出的界定。但是，河姆渡第一文化层的考古发现证明：河姆渡先民的诸多重大发明、创造，比如以栽培稻为主的农业文明、骨木结合的耒耜、榫卯木构件、舟楫、陶器、乐器等等，都比包牺氏、神农氏、黄帝更早更先进，很多古籍中都载有这样的传说：神农氏尝百草，黄帝造釜灶。但是，在神农氏尝百草寻找食物时，河姆渡人已经

在经营规模农业了。科学测定表明：河姆渡人创造的灶与釜是在黄帝之前 2000—1500 年，考古学家确认：河姆渡的灶、釜，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炊具，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迄今为止也是独一无二的。

以往，人们几乎有口皆碑：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发祥地。但是，河姆渡遗址发掘后，这个结论便被否定了。科学测定和研究成果已从多方面证明：中华民族的产生绝不是一元的，以河姆渡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诸多文化遗址，和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址一样，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同等的地位。国内外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均已确认了这一点。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指出：河姆渡遗址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半坡遗存同期，或更早些。菲律宾著名学者张德慈指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标志着中国早期文化至少有两个独立共存的中心”，“它导致了对……华东、华北两个共存文化的承认。”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指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中原文化一元论的认识”，“使人们把眼光投向长江流域的吴越地区。”美国著名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更为直率地说：河姆渡遗址“已经使一元进化的学说成了陈词老调。”一言以蔽之：河姆渡遗址告诉人们：长江、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摇篮。

河姆渡的考古发现还向中华民族是单一元的农耕民族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河姆渡遗址中的木桨、陶舟、大量的海鱼、贝类遗骸和制造舟楫的重要工具石镞等等海洋文化的典型标志物，都鲜明地体现了河姆渡的海洋文化特征。它表明：河姆渡先民已为原始舟船进入海洋创造了条件，他们已向浩瀚的海洋开拓生存空间。陶舟的出土，尤其意味深长。它表明：船这种物质形态不但进入了人们的生产、生